

#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儿童文学中“反抗”元素的比较研究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lement of Revolt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徐德荣（Xu Derong） 赵一凡（Zhao Yifan）

**内容摘要：**中西方儿童文学创作对于“反抗”元素的表现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视角，试从“反抗”元素出现的频率、反抗深度及反抗结果等方面分析比较中西儿童文学作品中“反抗”元素不同的表现，从中西方具有区别的伦理环境、伦理价值观以及儿童观等方面探析形成这诸多不同表现的具体动因，最终揭示“反抗”这一元素之于儿童文学的伦理构建意义与其具有批判性的道德教诲作用，并提出中国儿童文学实现“反抗”的理念与创作突破的建议。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儿童文学；“反抗”元素；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徐德荣，博士在读，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及其翻译。赵一凡，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学研究”(14BYY018)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史重大问题研究”(17YJC74003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lement of Revolt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Obvious differences can be observed when it comes to the element of revol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compares these differences in revolt frequency, revolt level and revolt resul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rom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view on children in order to work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revolt to children's literature's ethical construction, its critic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how breakthroughs in terms of revolt i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ould be made.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element of revolt;

### comparative study

**Authors:** Xu Derong, PhD candidat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area is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Email:77david@163.com) **Zhao Yifan** is a Master candidate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Email:zyf\_7006@qq.com).

“反抗”元素是儿童文学的应有之义。“从现实来看，在以成人作为主宰的社会精神环境中，儿童经常处于软弱无力的苦恼之中”（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202）。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其中对于自身的不合理之处，对真善美的本能追求会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渴望变革，由此而引发的反抗便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儿童文学中的“反抗”由于作者对“度”的把握不一，往往有离经叛道之嫌，那么既然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成长的“教科书”，“发挥着引导儿童道德完善的作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9），儿童文学又是怎样通过对儿童“反抗”的刻画帮助儿童实现道德成长的呢？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同兽相比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伦理意识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21）。儿童文学作者正是通过“反抗”的呈现帮助儿童读者获得“分辨善恶的能力”，从而树立“伦理意识”，成为有道德的人。可见，儿童文学中的“反抗”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教诲和伦理建构意义，而现在学界对儿童文学中“反抗”的研究极为缺乏，中西方对比的研究更暂付阙如，相关研究已是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当务之急。

对比发现，就“反抗”元素，中西方儿童文学创作差异显著。首先，“反抗”元素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差异明显：西方儿童文学“反抗”元素出现的频率远高于中国儿童文学。其次，作品中儿童反抗的深度不同，具体表现在反抗形式、程度、层次中，西方儿童文学中儿童的反抗诉求、反抗触及的层面比中国儿童文学体现地更加广泛、深入。此外，儿童反抗的最终结果也有明显区别：中国儿童文学更趋向于重归于好、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而在西方儿童文学中，儿童反抗的胜利往往更加彻底、不留余地。本文便从“反抗”元素出现的频率、反抗深度及反抗结果这三个方面分析比较中西儿童文学作品中“反抗”元素不同的表现，并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环境、伦理价值观以及儿童观等角度探析形成这诸多不同表现的具体动因，最终提炼、总结出“反抗”这一元素之于儿童文学的伦理构建意义、具有批判性的道德教诲作用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反抗”可以怎样借鉴西方经验，以实现理念和创作的突破。

## 一、“反抗”的表现

### 1. 频率

中西方儿童文学中“反抗”元素的差异，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出现频率不同，或者说作品数量的不同。

“反抗”元素鲜见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之中。有学者曾在文章中根据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代际划分：第一代以叶圣陶、冰心为代表，第二代以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等为代表，第三代则以孙幼军、葛翠琳为代表，1950年后出生的作家如曹文轩、沈石溪、秦文君、陈丹燕、班马等为第四代作家，而在1990年后迅速崛起的第五代作家以杨红樱等为代表（汤素兰 15）。这些作家可视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届的缩影，他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取向。通过阅读上述作家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从未创作过与“反抗”相关的作品。在众多作家作品中，勉强可以算作带有“反抗”因素的屈指可数，如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我的妈妈是精灵》等。中国作家似乎并不将儿童天然具有的反抗心理作为关注点，使得中国儿童文学从整体上缺乏对“反抗”元素的呈现。

相比之下，西方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反抗心理更为关注。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杰奎琳·威尔逊与杨红樱同样是擅长描写青少年儿童成长历程、成长心理的作家，但与杨红樱不同的是，她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常常对儿童反抗精神有着生动的刻画，作品中不乏对反抗精神的赞扬。如《1+1=0》中叛逆的双胞胎姐姐红宝石，这位青春期小姑娘的“反抗”在其笔下率真、自尊，比乖乖女更显可爱。童话作家罗尔德·达尔一以贯之的创作元素便是儿童的反抗精神，“反抗”元素甚至可以作为达尔童话的代表性标签。整体而言，在西方儿童文学创作史上，“反抗”这一元素从未间断出现。从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到茨威格的《守不住的秘密》再到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无不展现着儿童的反抗精神，这些作品将儿童这一特殊心理生动地摆在读者面前，往往让成人也深感理解。

中西方在“反抗”这一创作元素上的选择差异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与中西伦理环境、伦理价值观以及不同的儿童观等各方因素息息相关，本文第三部分将就此展开详细论述。

### 2. 深度

就中国儿童文学少量的带有“反抗”因素的小说而言，其中所表现的反抗深度也与西方儿童文学有较大差异，具体可以细分为反抗形式、反抗程度、反抗层次、反抗诉求以及诉求触及的深度等方面。

首先，从反抗形式来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的反抗多表现得较为缓和，与其说是“反抗”，倒不如用“淘气”来形容更贴切。作品中描绘的

情形常常是学生与学校、孩子与家长之间的表层矛盾，情节多体现了孩子的不成熟性。其反抗行为也多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想象中儿童所“力所能及”的事情，如顶嘴、逃学、不写作业等。这类带有“反抗”因素的作品常有的模式便是通过这一系列冲突的解决，儿童与成人最终握手言和，孩子实现了“成长”，变得懂事、听话，理解学校的好意、家长的苦心。典型的例子便是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作者在描绘逃学生李小乔顽劣的同时，笔墨较多地表现出其对学校生活的想念，还借李小乔之口为看起来可恶的老师平反，表示她们就像自己的“妈妈”（班马 201），自己“好像成了她们的儿子”（203）。相较之下，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反抗形式更为多样，并不局限在学校或学习生活之中，有些反抗方式甚至“大逆不道”。如在达尔的幻想小说《小乔治的神奇魔药》中，小乔治为了对付可怕的姥姥，竟然生出把姥姥炸掉的念头，而他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苦心研制给姥姥一“爆炸性打击”的魔药。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没有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颇有教训意味的“虚假”反抗，其描写的反抗常显夸张甚至荒诞。

其次，在反抗程度方面，中国儿童文学中儿童的反抗可概括为“撒娇式反抗”，其种种反抗常常表现为老师及家长监控之下的小打小闹。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也将儿童的反抗行为严格控制在社会道德的禁锢以内。陈丹燕所著《我的妈妈是精灵》中，“我”为了阻止爸爸妈妈离婚而“学坏”，使出浑身解数来改变爸爸妈妈的想法。而无论是穿奇装异服、抽烟、说脏话，都改变不了其“向善”的本质：“我”是为了不让爸爸妈妈离婚而这么做的。小说中明确定义某些行为是“坏”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叫小读者不要模仿。如此反抗似乎并未触及儿童内心深层的反抗动因，主人公的行为带有反面教材性质，往往难以真正引起儿童的共鸣。与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撒娇式反抗”相对照，西方儿童文学中的反抗可总结为“造反式反抗”。这种反抗更加激烈、大胆，儿童与成人两方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彻底敌对状态。依然以上述《小乔治的神奇魔药》为例，全书着重描写了小乔治与姥姥“斗法”的过程，最终结局是姥姥服下小乔治配制的神奇魔药，整个身体缩小直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程度的反抗若是放在中国是骇人听闻的，无论如何中国作家们也不会创作出外孙谋杀姥姥的情节。然而在中国，达尔的此类作品非常受欢迎，读者并不觉得有唐突之处。由此可以推断，人类的反抗精神不分国度、生而有之，在某些情境下，反抗并非忤逆，而常常是争取个人伦理意识觉醒的斗争。

就反抗层次而言，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反抗”元素触及深度较西方更浅，常常有意将儿童的叛逆行为刻画成逗乐的滑稽剧，《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便属此类。这类作品内容轻松、热闹，搏读者一笑后尚不能引起其对于儿童反抗行为的反思，仿佛儿童天生并不懂反抗，只是淘气而已。而西方儿童文学则关照到儿童之所以有反抗行为的内在动因，通过情节设置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主人公之所以会如此举措的原因，从而再极端的反抗手段也

变得顺理成章、妙趣横生。

此外，中西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差异还体现在儿童反抗的不同诉求中。中国儿童的诉求通常为呼唤父母的爱，寻求亲情的庇护，从而将自己的身心回归家庭。而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刻画的叛逆儿童，其诉求更多的是个人独立与尊严。这可以说是创作观的不同，但归根结底是儿童观的不同。不同的儿童观是导致中西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动因的直接原因之一，加之伦理环境以及伦理价值观这两方面，三者共同造成了中西儿童对于“反抗”元素取舍的不同选择。

### 3. 结果

如上文所谈，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结局大都为大团圆收尾。儿童与成人达成和解，皆大欢喜。在《上锁的抽屉》中，主人公“我”进入青春期，随着身体以及心理的逐渐成熟，渴望摆脱成人的管理与监控，建立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秘密，并为自己的抽屉上了锁，这便引发了父母的不安，矛盾冲突由此产生。而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我”与父母握手言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得到了父母的信任和保护，最终变得快乐、自信，放弃了与父母的对抗。与中国这种和谐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童话作家达尔的作品。其小说中，儿童与成人对抗定有一方(儿童方)将另一方(成人方)彻底击垮，实现对抗的彻底胜利。在《詹姆斯与大仙桃》中，自私、残暴的海绵团姨妈与大头钉姨妈被滚动的大仙桃“扑哧一声”碾成了平平薄薄的纸片人，再也不能大吼大叫、为非作歹了；在《玛蒂尔达》中，邪恶的校长最终被吓跑，贪婪的爸爸因为罪行败露而逃之夭夭，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玛蒂尔达都过上了舒心的生活。

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故事的结尾通常伴随着“反抗”元素的消失。“反抗”元素只是作为情节演进的一个临时性过渡，最终的落脚点是爱与家庭。而西方儿童文学中，基于儿童反抗的胜利，反抗精神得以保留，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争取个人尊严的有效途径而传承下来。可以说在西方价值中，反抗是恒久存在的实现自我独立、完成伦理选择的必经之路。

刘绪源在谈及儿童内心“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152）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其“渴望母爱与家庭温暖”的需求，显然，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更加侧重于后一种渴望，西方儿童文学作家则更关注前者。下文将针对这两种不同倾向的产生动因展开具体分析。

## 二、“反抗”元素形成的动因

### 1. 不同的伦理环境

讨论中西儿童文学作家对于“反抗”元素的表现差异，绕不开中西迥然不同的伦理环境。所谓伦理环境，即“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聂珍钊，《文

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中西儿童文学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其差异化的伦理环境直接影响了“反抗”元素的不同。

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封建文明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是深刻入骨的，构成了中国文学创作独特的伦理环境。中国能够成为唯一留存的四大古文明之国，除了汉字这一表意文字的作用，还要归功于统治阶层士阶层的延续。底层人民想要改变命运上升为“士”，唯一的途径便是通过科举考试。由此，重文轻武的观念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士阶层绝大多数是文士，观念保守，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圭臬，缺乏反抗精神。中国稳固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上千年，在西方列强将其日渐衰朽的大门轰开之时，中国士阶层开始觉醒，但这种觉醒仅仅是试探性的。无论是治标不治本的洋务运动，亦或是仅维持了百日的戊戌变法，无不体现出士阶层怯懦、软弱的本性。这样的改良尝试，是生死存亡之时不得不变的无奈举措，这样温和的改良与中华民族在两千年的封建统治高压下养成的民族性格密切相关。因此，哪怕是辛亥革命最终也依然以失败而告终。士阶层并未伴随新中国的诞生而消失。新中国的领导阶层大多自小接受旧式教育，直到而立之年以后才得以接触新文化，他们的心中依然保有中国传统士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与胸怀。中华文明因士阶层的延续而得以代代相传，但同时一代代士之信仰与精神的传递也将其中庸、温和、不善反抗的性格保留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性格内核。余英时在提及中国士阶层之弊端时，谈到：“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经不起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余英时 157)。并且进一步解释道，在长期的专制统治压迫下(历代文人因言获罪的例子并不罕见，清朝的文字狱更是将其发展到登峰造极)，士阶层不仅渐渐丧失了自信与自尊，而且还滋生了一种“自疑和自罪的潜意识”(158)。这种“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158)便是士阶层产生怯于反抗的性格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反抗”元素的缺乏。叶圣陶的短篇童话《稻草人》便可看作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心无力”的一个生动暗喻。故事中的稻草人站在田野里看尽了中国农民遭受的种种不幸，却因自己的手脚也被紧紧捆住而无法改变什么，最终它非但没有拯救别人，自己也痛苦而又无奈地倒下了。叶圣陶本人也曾解析过稻草人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层意义，他形容自己笔下的稻草人是一个空有满腔同情却没有足够力量改变现状的人，它代表着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自己则是不自觉地写出了他们的苦恼(王泉根 92)。

相较于中国的文士，西方的统治阶层骑士阶层则大多是勇猛善战的武士。许倬云曾评价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腊文明为“武勇的文化”、“侵略和扩张的文化”(许倬云 39)。希腊这种扩张好斗的精神贯穿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从欧洲扩张时代的开始，到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再到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战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两河文明也对其反抗

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两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显著，这一地区沙漠与海洋并存，高山与平原相望，这样对立的地理特征在一定意义上促使这一地区发展出一种“二元相悖乎互斥的思维方式”（许倬云 58）。这样一刀切的思维方式使得一方很难与相对一方融合，冲突便成为必然。“在对抗中求得胜利”（许倬云 68）的心态便成为西方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因之一。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到新科技革命再到启蒙运动，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再到美国革命，整个过程是充满斗争、反抗，是武力争取个人尊严与独立的历史。如此的反抗精神也深深注入了其文学作品中。在成人主宰的世界里，儿童常常处在弱势的一方，因此儿童文学作品中体现儿童反抗成人的情节便屡见不鲜，这与其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伦理环境密切相关。

## 2. 不同的伦理价值观

基于上述的伦理环境背景，中西方各自养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而不同的民族性格，进一步使他们形成截然相反的伦理价值取向，儿童文学创作观也因此产生分异。

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形成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在历史中不断融合其他思想的文化，因此包容性便成为其典型特征之一，中华文明亦如此。早在汉代，儒家就已经开始了吸纳、融合的进程，最典型的体现便是其时“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在外以儒家为门面，在内以法家为工具。在随后的朝代中，儒家思想不断地更新、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也渐渐与儒家文化的某些部分融合。中国人作为一个务实的民族，便也坦然接受了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并立。对于至圣先师孔子的崇拜并不影响一个人去寺庙里烧香拜佛，也不影响其算卦、看风水。许倬云将这种包容的性格总结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所在”（许倬云 58）。因此，与西方“二元相悖乎互斥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养成的是一种“二元互补、二元演化的思维方式”（许倬云 60）。中国人更倾向于包容、和谐，而非西方的斗争、反抗。由此，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有着更多的妥协因素便也不足为奇。

除了对于包容的推崇，儒家思想对于“秩序”、“规矩”严苛的要求，也深深植人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儒家典籍中有专门的《孝经》，“孝”字在《论语》中见于十四章之多，儒家文化对于“孝”的推崇便可见一斑。儒家所倡导的“父为子纲”、“长者为尊”直至今天依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叛逆”避之不及。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叛逆、孩子”这一词条，赫然出现“孩子叛逆怎么办？”、“十大妙招搞定叛逆孩子”等热门话题。在儿童文学产业中，“反抗”因素的市场需求几乎为零，这自然导致了儿童文学创作中反抗精神的缺失。

而在西方，反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国家进步的旗帜。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精神的重要源头，其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影响深远。思想家恩

斯特·布洛赫认为：“一个读了《圣经》而不做革命之梦的人是误读《圣经》的人”（金寿铁 112；Bloch 345）。圣经中耶稣的降临，象征着希望，但这种希望不是要人们坐享其成地站在原地等待救赎，而是警醒人们勇敢地斗争，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在新约《马太福音》第 10 章第 34 节里，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把和平带到人间的，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在某种程度上，耶稣是一位引导人们为自己而战的英雄。《圣经》中的道德教诲对于不乏此类“反抗”因素，耶稣还曾训诫他的信众“要警醒”，这种反对既有体制的解放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代西方人的伦理价值取向。

影响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另一重要文献便是反映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美国人民对于殖民压迫一次铿锵有力的反抗，其内容及精神深深植入了美国人的价值观。这种反抗精神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平权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女权运动等。背靠此种精神传统，其儿童文学中难免会有着更多“英雄式”的叛逆少年形象，汤姆·索亚、哈克贝利·芬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西方当然不仅仅包括美国，但稍加观察我们会发现，所谓“西方”列国的立国纲领，其精神内核常有惊人的巧合，美国有《独立宣言》，英国有《权利法案》，法国有《人权宣言》——国虽不同，但其精神传统殊途同归。而这也恰恰使得笔者得以将中国与整个“西方”儿童文学创作做比较之研究。

### 3. 不同的儿童观

如同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西方发现儿童的历史及秉持的儿童观亦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导致两方儿童文学创作中“反抗”元素表现不同的另一原因。

“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发现与发展，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12）。在这一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思想家们逐渐意识到了儿童与大人的不同，他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三号中提出：“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刘绪源，《周作人论儿童文学》38），并进而总结出儿童在人格上与成人平等，而在生理心理上又有自己的独特性等“儿童本位”观点。然而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于儿童的发现经历过一定程度的倒退，教育工具主义的儿童观曾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功利主义的儿童观依然根深蒂固。“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朱自强，《经典这样告诉我们》54）这种功利主义视儿童为“成人的预备”，基于此观点创作的儿童文学是“包着薄薄糖衣的药丸”（55），让孩子“以为是在游戏，实际上却从早到晚都在学习”（55）。这种观点在中国长时期地占据市场同中国人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儿童的发现和认识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自然体现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就“反抗”元素而言，未有对其本身蕴含的的文学伦理价值进行审慎、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在创作中缺乏深度和广度也就成了必然。我们看到，

在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当出现儿童遭遇来自成人世界的侵犯或者伤害时，聚焦点主要在于儿童对于自我（体表特征和心理）认知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反抗”言行往往具有原发性，即儿童在特定成长阶段（第一反抗期、青春期）自然而然表现出的反成人意识，而具体的反抗策略以及反抗结局并非重点。

西方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却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专为儿童阅读的书籍最早在十七世纪出现，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仅仅是实现宗教教育的工具，说教意味浓厚。启蒙运动时期，以约翰·洛克、卢梭为代表的学者摒弃了清教徒儿童文学中的宗教原罪观念，洛克认为儿童是“珍贵的人的资源”，卢梭则更进一步阐明“儿童不是作为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才重要，而是本来就是重要的”(34-36)。虽然他们的主张比前人离“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更接近了一些，但仍改变不了他们实际行为中履行着教训主义态度的本质。时间继续向后推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浪漫主义儿童文学兴起，英国作家巴里所著《彼得·潘》以及米尔恩所著《小熊温尼·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作品反映出成年人对于幼年时代的乡愁，赞美童心，渐渐脱离了儿童文学中的说教意味。进入二十世纪，在“拯救儿童”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儿童文学迈出了具有区别意义的一步：“从成年观念中的儿童，走向现实生活中的儿童”(41)，发展形成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此引用朱自强教授的观点，对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加以阐明：

既不是把儿童看做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与教训儿童（如历史上的教训主义儿童观），也不是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如历史上童心主义的儿童观），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始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25）

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对于儿童存在的漠视以及儿童观思考的不足，西方儿童文学历经教训主义、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如今秉持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体现出从教育性到娱乐性、从教训性到解放性的总体发展轨迹。正是在上述发展轨迹的影响下，儿童文学创作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宽容度，更有条件实现读者乃至全社会对于儿童文学作品提出的伦理问题进行理性讨论和思考，并以某种形式形成社会共识。

### 三、“反抗”的意义

儿童需要形成分辨善恶的能力，获得伦理意识，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这正是儿童文学中“反抗”的意义和使命所在。毋庸置疑，儿童文学担负着引

领儿童道德成长、伦理建构的使命，而当今时代的伦理道德意识绝非旨在使儿童能够成为被动接受的“顺民”，而是有着明确的善恶观念、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意识的人。儿童文学中的“反抗”能够引发儿童以及成人读者对是非善恶进行思考，从而形成伦理意识，获得道德教诲。儿童文学中的“反抗”元素的意义之一便在于此。此外，儿童在与生活的搏斗之中所自然流露出的反抗精神，正是儿童本位儿童观所强调的“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儿童文学作家需要做的便是与儿童“同谋”，成为儿童反抗成人的“同案犯”（朱自强，《经典这样告诉我们》83），将自己融入儿童独特的生命世界，从而引导儿童实现更广阔的生命发展。

儿童文学对于反抗精神的直面能够帮助儿童实现现实伦理构建。如《激进的儿童文学》（*Radical Children's Literature*）中所言：

简短文本里的文字、意象往往能够传递有关经验、情感、审视自我、审视世界所必需的心理建设及思想工具，将这些填满一代代小读者的头脑。

( It is the words and images of often physically small texts that turn out to be capable of filling the minds of generations of young readers with experiences, emotions, and the mental furniture and tools necessary for thinking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they inhabit. ) ( Reynolds 1 )

读者伴随着儿童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成熟，“亦能潜移默化地向成人的知识与经验迈近一步” ( and by implication, readers too will have moved a step closer to adul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 ( 2 )。这过程即为儿童由“兽”向“人”的转变，儿童在搏斗中逐渐树立稳定的伦理意识，产生真正的善恶观念，从而逐步完成理性的伦理选择。

同时，儿童文学中的反抗精神已能够唤起成人自己内心雪藏已久的“叛逆”。儿童文学中儿童纯真的反抗可以引起或许已经变得麻木的成人反思，重新拾起自己的潜在的童心。尽管长期以来，儿童文学常常不被视为正统文学，游离在主流文学之外，但恰恰这种不受重视反倒给了儿童文学自由发展的机会。Kimberley Reynolds 曾将儿童文学的这种自由与其它文化传播途径进行比较：

加之于电视节目、电影、动漫、杂志、电脑游戏叙事的规范、审查相较加之于儿童文学叙事的规范、审查，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 There i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regulation and scrutiny applied to narrative forms such as televisions, films, comics, magazines and computer games, and that give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

( 15 )

因此，许多时候，儿童文学无心插柳成为了“激发与滋养创新( stimulating and nurturing innovation )”( 16 )的佳径。这其中，反抗精神无疑是一大促进力。通过“促成成人对于自身做法的道德反思以及教育方法的改良”( 徐德荣 姜珊 21 )，加强对于儿童伦理观念养成的认识，提高社会对于儿童伦理观念的保护。

对比研究中西儿童文学对于“反抗”元素的不同态度及形成动因，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有待发展的部分。首先，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应将儿童的“反抗”心理行之有效地用于创作中，帮助儿童形成善恶分辨能力，实现儿童的伦理启蒙；以“反抗”引发而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的思考，促进伦理体系的更新和发展。此外，还应增强儿童本位的创作意识，关照儿童内心的真实诉求，深入到儿童的生命空间，与儿童携手走在人生的路上。同时，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应该探索儿童文学所蕴含的变革力量，探索包括“反抗”在内的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所较为忽视的元素，探索这类元素对于道德教诲、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创作空间和视界。归根结底，“反抗”元素之所以在西方盛行，是西方儿童本位思想发展至今的结果，是认识到伦理构建自然过程的结果，“反抗”元素的表现方式和内涵有着广阔的空间和重要的伦理价值，值得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深入探索和体验。除了启示儿童文学创作，对比研究中西“反抗”元素也能够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开辟方向，关注“反抗”这一特殊儿童心理或能够帮助儿童文学研究实现新的理论突破。当然，“反抗”元素的呈现需要把握“度”，要避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盲目创作，忽视“反抗”元素的真正价值所在。

### 结语

人类是在真理与谎言中义无反顾地选择哪怕会带来痛苦的真理，才得以不断发展进步。追求真相、追寻平等对话，需要反抗精神。顺着柏拉图洞穴理论的思路，激烈的争辩大约永远好过无声的和谐。儿童对成人世界不合理之处的争辩正是书写在一部部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上。儿童文学创作者应直面儿童的反抗精神，正视儿童伦理构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儿童实现自身的伦理构建。当现有的伦理无法解决儿童内心当下面临的问题，通过“反抗”、打破旧的伦理秩序，儿童可实现新的适应现状的伦理构建。从伦理混沌到理性选择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在一次次推倒重来中，儿童文学中的“反抗”因素能够帮助儿童不断更新、迭代伦理建设，最终实现内心的伦理平衡，使得理性的伦理选择在符合真、善、美的基础上也符合内心原初的生命欲求。同时，儿童文学中体现在儿童与家庭、儿童与学校、个人与工作、人与自然等诸多情景中的“反抗”元素还通过对于成人读者的启发从各方面

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观念。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儿童文学创作在“反抗”元素出现频率、反抗深度及反抗结果上的差异，分析其中的内在动因，旨在发现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尚需补长之处以及如何补长之法。比较发现，“反抗”元素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而言，是一个亟待开采的巨大矿藏。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应大胆尝试，发掘这一元素更多富有价值的可能性。

## Works Cited

- 班马：《六年级大逃亡》。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Ban Ma. *The Great Escape of a Boy in Grade Six*. Nanchang: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2013.]
- 金寿铁：“反抗与叛逆的基督教——恩斯特·布洛赫的圣经观”，《世界宗教研究》2（2016）：  
 111-127。转引自恩斯特·布洛赫：《基督教中的无神论》。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1968。  
 [Jin Shoutie. “The Revolt and Rebellion of Christianity: Ernst Bloch’s View of the Bible.”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2 (2016): 111-127. Qtd. Ernst Bloch: *Atheismus im Christentum. Zui Religion des Exodus und des Reich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8.]
- 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Liu Xuyuan. *The Three Motifs in Children Literatur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 *Zhou Zuoren’s Review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Beijing: Dolphin Books, 2012.]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s*. Wuha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 Reynolds, Kimberley. *Radical Children’s Literature: Future Visions and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s in Juvenile F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7.
- 汤素兰：“中国儿童文学的变化发展趋势”，《创作与评论》177（2013）：14-18。  
 [Tang Sulan.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al Trend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177 (2013): 14-18.]
-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Wang Quangen.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2000.]
- ：“现实主义：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主潮”，《河南社会科学》6（2016）：90-99。  
 [—. “Realism: Main Development Tide of One Hundred Years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Henan Social Sciences* 6 (2016): 90-99.]
- 徐德荣 姜珊：“罗尔德·达尔幻想儿童文学中的‘反抗’主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4 (2017) : 17-21.

[Xu Derong, Jiang Shan. "The Theme of 'Revolt' in Roald Dahl's Fantasy Children's Literature."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4 (2017):17-21.]

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Xu Zhuoyu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trasted*.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Yu Yingshu. *Collections of Yu Yingshi's Essays (Vol 4) Observation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Zhu Ziqiang.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9.]

—：《儿童文学的本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 *The Nat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hanghai: Juvenile and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1997.]

—：《经典这样告诉我们》。济南：明天出版社，2010。

[—. *So the Classics Tell Us*. Jinan: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10.]

责任编辑：王晓兰